

## 「後續」與「延伸」：錢鍾書與文言\*

韓知延\*\*

### 目 录

1. 前言
2. 「折衷古今」, 「融匯新舊」: 錢鍾書筆下的文言
3. 「詩心」與「文心」: 錢鍾書學術研究與文言實踐
4. 結語

### 中文摘要

1930年代錢鍾書在他的單篇文章中明確地總結出自己的文學思想觀念, 其中錢鍾書對「文言」所闡發的見解引人矚目: 在「五四」前後複雜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文言白話之爭」也被看成是一種革命, 然而錢鍾書卻將文言和白話看作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關係, 兩者之間的互動是良性的。在白話文學的發展歷程上, 錢鍾書認為文言詩文相互借重, 指出文言文的「彈性」, 並將文言文視為古今對話的天然「載體」, 尋找兩者之間的折衷點, 以此為起點展開自己的學術研究; 錢鍾書與「文言」, 與他的學術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整體聯繫, 錢鍾書所著的巨作《談藝錄》、《管錘編》均以「文言」撰寫, 充分顯示出錢鍾書不拘一格的治學風格, 其背後的意蘊不容忽視。對錢

\* 이 논문은 2024년도 중앙대학교 연구년 결과물로 제출됨(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Chung-Ang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 in 2024).

이 논문은 2025년 3월 7일 타이완 명관대학(銘傳大學)에서 개최한 「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 국제학술대회에서 발표한 논문을 수정·보완한 것임(This work is written by developing the idea presented at the 2025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held in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March 7, 2025]).

\*\* 중앙대학교 아시아문화학부 부교수

鍾書來講，文言不只是撰寫文章的手段和文字表達的形式，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和動蕩的政治格局中表達自己的學術旨趣和詮釋方法，以至於其背後蘊含著錢鍾書對待文藝的心理和歷史的基本態度。

**關鍵詞：**錢鍾書，文言，彈性，《談藝錄》，《管錐編》，詩心，文心

## 1. 前言

錢鍾書（1910-1998）博學多才、學貫中西，被眾人稱為「民國第一才子」、「文化崑崙」、「一代鴻儒」以及「中國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sup>1)</sup>，研究者遍及中國大陸、港台和海外，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學術著作，皆膾炙人口，其中錢氏所撰《談藝錄》與《管錐編》，早已成為經典之作。錢鍾書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把多年所積累的知識、讀書心得和學術思維，通過各種文體和體裁來展現出自己獨特的視角，並以獨特的視角實現「文」與「學」之打通，以及兩者間的多層次互動，顯得耐人尋味。錢鍾書之所以能打通「文」與「學」，可追溯到他的家學淵源，從幼時起在父親錢基博（1887-1957）的嚴格教育下訓練如何做文章，這與錢氏深厚的古文根底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錢鍾書所留下的文字龐大，涉及領域廣泛，將錢鍾書作為研究對象者不限於中國學術界，更是在國外學術界享有更高的聲譽，由於夏志清先生所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錢鍾書給予高度評價<sup>2)</sup>，曾在美國學術界掀起一股「錢鍾書熱」，且在中國大陸業已形成專門研究錢鍾書的「錢學」，足以證明錢鍾書其人的魅力，也足以證明錢鍾書豐富而獨特的學問世界。正因如此，韓國學術界也開始關注錢鍾書其人其文，也曾掀起過錢鍾書研究熱。無論

1)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中國時報》1998年12月24日。此文後來收入余英時所著的《余英時雜文集》（台北：聯經，2022年11月），頁54。

2) 詳見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錢鍾書〉，《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73-392。

是韓國還是海外，專門研究錢鍾書的學術論文累計產量不算少；此外，2008年12月15日清華大學舉辦追思錢鍾書先生系列紀念活動<sup>3)</sup>，當時所開展的「錢鍾書紀念展覽」作為錢鍾書先生系列紀念活動的序幕，其內容包括「錢鍾書先生生平」、「學術成就」、「錢鍾書先生與清華大學」、「海內外及校友對先生的評價」等幾個版塊，展現錢鍾書的學識和人格魅力。

與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直接有關的前人研究有焦亞東的〈論錢鍾書學術著述文言語體的生成及意義〉（《淮陽師範學院學報》，2022年第44卷第4期），將錢鍾書用典雅凝練的文言寫就的幾部學術著作（《談藝錄》、《管錐編》以及《錢鍾書手稿集》中的《中文筆記》、《外文筆記》和《容安館札記》等）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錢鍾書用文言撰寫的原因，指出錢氏的文言語體與這幾部學術著作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特殊的文體樣式之間的關係；此外，韓知延的博士論文《錢鍾書：「文」與「學」之間（1929-1949）》（北京大學，2013年）中將文言視為錢鍾書學術著作的內在機制，探討其在錢鍾書的學術著作及單篇文章中所體現的「文體感」。

然而，本論文更注重的是錢鍾書對於文言白話之爭所持有的辯證客觀的立場背後的心理和態度。衆人周知，文言既作為區分舊文學和新文學的標準，也作為體現學識修養的重要方式。然而，錢鍾書不承認「五四」時期所提出的「活文學」、「死文學」等命題，尤其是錢氏並未將文言看作一類「守舊」的文體，指出文言文的「彈性」，認為文言與白話兩者既相互替代也有互補性，可並行不悖。可見錢鍾書一生所做的學術研究及著述背後都蘊含著這種思維的靈活性，這是本次研究的重點的同時，也是與前人研究的不同之處；此外，早在1930年代時，錢鍾書在他的單篇文章中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文學觀念：不重視文學史上的實證方面，而是重視「詞章」方面，因此達到「頗採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sup>4)</sup>之目的與「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sup>5)</sup>的學術

3) 《清華大學舉辦追思錢鍾書先生系列紀念活動》，<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012/2117.htm>，檢閱日期：2024年12月19日。

4) 錢鍾書：《談藝錄·序》（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頁1。

5)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頁1。

追求，其背後處處蘊含著錢氏對待文藝的心理和歷史的基本態度。因為對錢鍾書來講，文言不只是撰寫文章的手段和文字表達的形式，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中表達自己的學術立場和詮釋方法，這無疑是錢氏的文學觀念與他同時期的學人的不同之處，也是本次研究的重點之一。

## 2. 「折衷古今」，「融匯新舊」：錢鍾書筆下的文言

一九三三年九月，錢鍾書在清華畢業後應聘到上海光華大學，以講師的名義在光華外文系講課的同時，也兼英文刊物*The China Critic*（《中國評論周刊》）編輯。但需要註意的是，錢氏在光華的期間不只是講課，從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赴英國留學為止，還撰寫詩文並發表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力的報刊上，共有二十二篇：

- 〈作者五人〉（署名中書君，《大公報·世界思潮》第56期，1933年10月5日）
- 〈中國文學小史序論〉（《國風》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16日）
- 〈讀《道德定律的存在問題》書後〉（署名中書君，《光華大學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10月25日）
- 〈論俗氣〉（署名中書君，《大公報·文藝副刊》，1933年11月4日）
-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China Critic*第7卷第45期，1934年11月8日)
- 〈闕題〉（署名中書君，《光華大學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11月25日）
- 〈壬申年秋抄雜詩〉（《國風》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
- 〈詩錄〉（《國風》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
- 〈春遊紀事詩十九首〉（《光華大學半月刊》第2卷第8期，1934年4月15日）

- Su Tu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 (《學文月刊》第1卷第2期, 1934年6月1日)
- 〈北遊紀事詩二十一首、詩二首〉 (《國風》第4卷第11期, 1934年6月1日)
- 〈哭管略〉 (《國風》第5卷第1期, 1934年7月1日)
- 〈與張君曉峯書〉 (《國風》第5卷第1期, 1934年7月1日)
- 〈論不隔〉 (署名中書君, 《學文月刊》第1卷第3期, 1934年7月)
- 〈中書君詩〉 (《國風》第5卷第6期、第7期合期, 1934年10月1日)
- 〈論復古〉 (署名中書君, 《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11期, 1934年10月17日)
- 《中書君詩初刊》<sup>6)</sup> (1934年10月第1版, 非賣品)
- 〈馬克思傳〉 (《人間世》第19期, 1935年1月5日)
- 〈中書君詩〉 (《國風》第6卷第3期、第4期, 1935年2月1日)
- 〈中書君詩〉 (《國風》第6卷第5期、第6期, 1935年3月1日)
- 〈中書君詩〉 (《國風》第6卷第9期、第10期, 1935年5月1日)
- 〈不夠知己〉 (署名中書君, 《人間世》第29期, 1935年6月5日)

上述所列詩文均為錢鍾書在光華任教時所撰寫的，與錢鍾書的學術專著相比，不能被稱為大作，但這時期錢氏寫出有深度的文章，從對歷史的重視、也對文藝的理解出發，在當時新舊交替的時代中的文學現象作了縝密觀察和分析，從中提出自己的文學觀念和衡文標準。其中，文言白話之爭無疑作為頗有代表性的文學現象之一，這是因為這場爭論針對的是文學表達形式、語言風格和文學創作的目標等方面，所貫穿的是新舊學派各自所持的文化立場，因此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被視為敏感的問題。對此問題，錢鍾書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就淋漓盡致地體現在〈與張君曉峯<sup>7)</sup>書〉一文中。

不難發現，〈與張君曉峯書〉為與歷史學家張其昀（1901-1985）之間的書

6) 此為錢鍾書第一部詩集。

7) 「曉峰」為張其昀的字，但在原始文獻上錢鍾書所用的是「峰」的本字「峯」。

信。1934年，張其昀請錢鍾書就新舊文學的關係問題談談自己的見解。同年6月10日，錢鍾書給張其昀寫了一封回信，發表在《國風》第五卷第一期（1934年7月1日）上。《國風》是「南高學派」柳詒徵（1880-1956）、繆鳳林（1899-1959）等人在南京創辦的學刊，以倡導中國本位文化、開展人文復興為任<sup>8)</sup>，圍繞對於傳統與西化、文言與白話等問題，與全盤西化派爭辯，在民國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從邏輯淵源看，「南高學派」可以說是晚清國粹派的第二期發展，張其昀就是「南高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sup>9)</sup> 據此似初步可推測錢鍾書應張其昀之請，在《國風》上發表自己對新舊文學的關係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並圍繞文言白話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依據原文內容，舉出其要旨（括號內的文字為〈與張君曉峯書〉原文及其《國風》頁碼）<sup>10)</sup>，具體如下：

- 一、文言與白話一樣，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往日之所以輸攻墨守，爭端大起者，以雙方皆未消門戶之見，深閉固拒，挾恐見破，各否認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價值也。」，頁14）；
- 二、就文學欣賞而言，文言作品和白話作品各有其美，難以簡單判斷優劣的差異。（「竊謂苟自文藝欣賞之觀點論之，則文言白話，驂驪比美，正未容軒輊。」，頁14）；
- 三、白話文要寫得好，與寫文言文同樣困難，有的文筆很好白話文比優美的文言文更困難。（「白話至高甚美之作，亦斷非可家喻戶曉，為道聽塗說之資。往往勾深索隱，難有倍於文言者。」，頁14）；
- 四、文言文用典故，原則上無可非議，這等同於白話文作品中的比喻與象

8) 柳詒徵在《國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道：「雖以總理遺教，昭示大經，欲復民族之精神，盛倡政治之哲學；而喪心病狂者，依然莫之或革，社會之震撼，風化之污濁，直欲同人道于禽獸；一飾以異域之所嘗有，隱莫之敢非。」；「聞諸子言，斯刊職志，本史跡以導政術，基地守以策民瘼，格物致知，擇善固執；雖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見，要以隆人格而升國格為主。」，由此明確表示該學刊的學術理念。詳見柳詒徵：〈國風·發刊詞〉，《國風》創刊號，1932年9月1日，頁2。

9) 李洪岩：《錢鍾書與近代學人》（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1月），頁65。

10) 錢鍾書：〈與張君曉峯書〉，《國風》第5卷第1期，1934年7月1日。

- 征手法，其性質相似，皆依據類比推理而來。（「譬之談者力非文言文之用典故，弟以為在原則上典故無可厚非；蓋與一切比喻象征，性質相同，皆根據類比推理（Analogy）來。」，頁14）；
- 五、若從文化史的背景上了解起來，文言白話皆為存在之事實；純粹歷史之觀點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說，二者亦無所去取愛憎。（「若從文化史了解之觀點論之，則文言白話皆為存在之事實；純粹歷史之觀點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說，二者亦無所去取愛憎。」，頁14）；
- 六、文章不能以繁簡判優劣。（「故以繁簡判優劣者，算博士之見耳；孔子曰：“詞達而已。”《養一齋詩話》所謂：“文章各有境界，宜繁而繁，亦簡而簡，推簡者為工，則減字法成不刊典。”，頁14）；
- 七、除了文章以繁簡判斷優劣之外，還不能以難易程度判斷文章之優劣，文藝之事，因難見巧。（「以難易判優劣者，惰夫懦夫因陋苟安之見耳；彼何知文藝之事政須因難見巧乎？」，頁14-15）；
- 八、專讀文言，並未保證一定能親切體會舊日中國文化。（「若云不讀文言則於吾邦舊日文化不得親切體會，弟亦以為不然。老師宿儒皓首窮經，亦往往記誦而已，於先哲之精神命脉，全然未窺，彼以版本考訂為文學哲學者，亦何嘗不以能讀古書自詡於人耶？」，頁15）；
- 九、讀書原本是「靈魂之冒險」，若其目的在於隨俗、免苦、獲利、求名，則失去讀書之真正意義。（「蓋讀書，本為“靈魂之冒險”，須發心自救，樹之為規律，威之以夏楚，懸之以科甲，以求一當，皆官樣文章而已！」，頁15）；
- 十、1930年代風行一時的小品文，將文言白話熔為一爐，這是因為出於文言的「彈性（Elasticity）」。（「抑弟以為白話文之流行，無形中使文言文增進彈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風行之白話小品文，專取晉宋以迄於有明之家常體為法，儘量使用文言，此點可征將來二者未必無由分而合之一境，吾儕倘能及身而見之歟！」，頁15）

可見圍繞「文言與白話」的主要問題，不難發現錢鍾書以辯證客觀的角度對此進行分析並闡發自己的看法，直截了當地指出文言的「彈性」，在此，錢鍾書所提到的「彈性」一詞，值得進一步探討。根據「彈性」的基本釋義，它可以應用在所有具有因果關係的變量之間，將它用來解釋文言的特點，此意味著容納與吸收外來的文化內容和因素。當我們追溯到當時「文白之爭」的歷史現場，文言的「彈性」則意味著在中西文化的衝突和新舊文學的交替下所產生的「文體互滲」現象，接過錢鍾書的思路，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不能相互排斥。

顯然，錢鍾書在肯定文言的前提之下，以「折衷」的立場來對待新舊文學交替下的文言與白話問題，其背後蘊含著他對文體的感覺（即「文體感」）。換言之，錢鍾書憑著自己的「文體感」審視當時中國文學新舊更替的場景，尤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文白之爭，進一步鞏固了白話的地位，使白話更加接近大眾的口頭語言，同時也使得曾經佔據著舉足輕重地位的文言的影響力下降。正是在這種不可抗力的歷史趨勢之下，錢鍾書卻敏銳地意識到文白之爭究竟是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場重要爭論的同時，也是一場中國文學史上的重大現象。當錢鍾書應張其昀之請時，文言和白話的較量仍在進行之中，但錢氏還是顯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堅持認為文言的「彈性」及其作用，即在白話文學的發展歷程上文言詩文相互借重，將文言文視為古今對話的天然「載體」。

此外錢鍾書在肯定文言背後的重要外因，從錢氏與前輩學人交遊之中可找到相關線索：首先，錢鍾書在光華教書的期間所撰寫的文章散見於各種刊物，其中，在《大公報》和《國風》上發表較多，前者為錢氏的恩師吳宓（1894-1978）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當錢鍾書在清華讀書時，與吳宓接觸交流得多，錢鍾書是吳宓最得意的學生，甚至於將錢氏當朋友對待，錢氏也對恩師吳宓有著深厚感情。而後者為南高派創辦的刊物，錢鍾書應張其昀之請，在《國風》上發表與張氏之間的書信。在此書信中錢鍾書對新舊文學乃至文言的看法，接近於南高派的學術傾向，據此可推測錢鍾書與南高派的學人有過交往，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錢鍾書受到當時民國史學中「南」「北」之爭

的學術風氣，同時也受到前輩學人的熏陶；其次，可參照葉公超（1904-1981）和錢鍾書之間的論學一事，據相關研究，錢鍾書早年詩作中有許多是對同時代人的調侃，在他後來的詩集中沒再收入，當時錢鍾書在他早年詩作中對時人和文壇表達自己的看法，有幾首錢鍾書早年絕句，多數詠人，在後出的《槐聚詩存》中刪除了。這幾首絕句中有一首是錢鍾書調侃當時「海派」和「京派」之爭的。原詩如下：「亦居魏闕亦江湖，兔窟營三莫守株；且執兩端開別派，斷章取義一葫蘆。」其理解為：人在江湖，心存魏闕。狡兔三窟。執兩用中。首鼠兩端。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今典則是當時的「海派」和「京派」之爭。<sup>11)</sup>

從上述幾點緣故中，不難發現錢鍾書對當時北大南高兩派之爭的感受如何，以及錢氏的學術立場較傾向於南高派，顯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特徵，足以影響到錢鍾書今後的文學研究及其學術旨趣，乃至錢氏對待文藝的心理和歷史的基本態度。

### 3. 「詩心」與「文心」：錢鍾書學術研究與文言實踐

錢鍾書與「文言」，與他的學術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整體聯繫，這就是錢鍾書所著的巨作《談藝錄》、《管錐編》。兩書的編寫體制、著述的動機及目的各不相同，但充分顯示出錢鍾書不拘一格的治學風格，其背後的意蘊不容忽視。

《談藝錄》取自明代前七子之一徐禎卿（1479-1511）的同名詩話，是一本專門談論中國古典詩歌及文藝創作的「賞析」著作的同時，也是一本「憂患」之書，據錢鍾書所言：「《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始屬稿湘西，甫就其半。」<sup>12)</sup>，前後聯繫起來看，隱約可見他對當時社會現實的關注。除此之外，從這段序言中不難發現，這是錢鍾書在湖南的藍田國

11) 參見謝泳：《錢鍾書交游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10月），頁4-5。

12) 錢鍾書：《談藝錄·序》（補訂本），頁1。

立師範學院外文系任教之時（1939年至1941年）所撰寫的，由冒效魯（1909-1988）提議，錢鍾書每完成一章，就交給吳忠匡（1916-2002）閱讀並審校<sup>13</sup>。1941年錢鍾書離開藍田之後回到上海，又補寫《談藝錄》另一半，1942年初稿完成，隨後又對此進行補訂，1948年6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直到1983年再增補訂稿，1984年9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至於《談藝錄》的編寫體式，錢鍾書以古代詩話的形式，並以漢代經學的注經方法和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作為方法，將兩者融會貫通，對唐宋以來的詩人和詩評家進行點評的同時，也對於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標準進行了深入探討。此書引用的參考資料高達1800多種，其中引述宋代以來的詩話有130余種，引述西方論著有500余種，涉獵古今中外的各種經典，將自己的知識積累以旁征博引的形式一點一滴地記錄下來。對此，有人曾指出：「《談藝錄》裡所引的歐西著作，顯然他都讀過原文，學問之廣，實在令人望洋興歎。」「《談藝錄》不是本花兩三天功夫讀完就算的書，它是本供舊詩讀者不時參閱的良伴。」因此被學界評價為「它是中國詩話裡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廣探西洋批評來詮註中國詩學的創新之作。」<sup>14</sup>。

與《談藝錄》不同，1979年10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管錐編》<sup>15</sup>是依照札記體例完成的一部古文筆記，據錢鍾書所述：「警觀疏記，識小積多。學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廣

13) 「一九四一年，在他臨離去藍田前，奮力清了一遍稿，謄錄了一本後，就在原稿本上，大筆一揮『付 忠匡藏之』五個大字，把它贈遺給了我。」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7月），頁197。此文原載廣州《隨筆》1988年7月號，後來收入牟曉鵬等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年11月），頁126-137。

14) 夏志清：〈追念錢鍾書先生——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中國時報》1976年2月9日至10日。此文後來收入夏志清所著的《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年4月，頁177-194）。

15) 共計七百七十九則，具體如下：第一冊《周易正義》（二十七則），《毛詩正義》（六十則），《左傳正義》（六十七則），《史記會注考證》（五十八則）；第二冊《老子王弼注》（十九則），《列子張湛註》（九則），《焦氏易林》（三十一則），《楚辭洪興祖補注》（十八則），《太平廣記》（二百一十三則）；第三、四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二百七十七則）。後來又增訂至五冊（即《管錐編增訂》）。

揚。又於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獻，其資於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sup>16)</sup>。爲此，錢鍾書採用中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的十部典籍（《周易》、《毛詩》、《左傳》、《史記》、《太平廣記》、《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辭》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進行了縝密的考疏。《管錐編》雖是學術札記，但錢鍾書引經據典，其論述旁征博引，所包含的內容卻極爲廣泛，無所不包，淋漓盡致地彰顯出錢鍾書深厚的學術功力。

顯然《談藝錄》和《管錐編》從編寫體制、著述的動機和目的及其所討論的對象截然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兩書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產生的，可謂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立足於中國古代典籍，並均以「文言」撰寫，無疑是錢鍾書學術專著的一大特色。在此需要我們探討的問題是錢鍾書何以用文言文著述，有其特別的原因：自從《談藝錄》和《管錐編》問世之後，曾有些人問錢鍾書爲何用文言文撰寫，據錢氏回答：「一曰特定時代成就此書，或可久存。二曰欲藉此測驗一下舊文體有多少彈性可以容納新思想。」<sup>17)</sup>而對於《管錐編》來講，錢氏則回答說：「我不是學者，我只是通人。我有太多的想法，若要是——鋪開寫來，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sup>18)</sup>「這樣可以減少毒素的傳播。」<sup>19)</sup>「《管錐編》引文多是文言，不宜楚楚譯爲白話，而且初稿是在文革中寫的，環境和時間都不充裕，不如徑用文言省事。」<sup>20)</sup>

可見錢鍾書在《管錐編》上所選擇的對象均爲中國古代經典巨著，其研讀難度頗高。因此研讀經典、疏證古典，「文言」無疑是最爲合適的文體<sup>21)</sup>，若

16) 錢鍾書：《管錐編·序》（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頁1。

17) 鄭延國：〈錢鍾書「化境」論與《談藝錄》譯句管窺〉，《翻譯學報》第三期（1999年3月），頁17。

18) 張隆溪：〈自成一家風骨——談錢鍾書著作的特點兼論系統與片斷思想的價值〉，《讀書》第10期（1992年10月），頁94。

19)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中國時報》1998年12月24日；也收入《余英時雜文集》，頁47。

20) 張隆溪：〈懷念錢鍾書先生〉，《香港文學》第173期（1999年5月），頁29-30。

用白話文對古書的義理加以補充、校訂、考證和闡釋，都有其自身的限制，或許無法進行詳細而準確的疏解和考證，一定意義上說，這可以被視為錢鍾書文體實踐的耐人尋味之處。

至於《談藝錄》一書，涉及到文評及詩話傳統的問題。就錢鍾書而言，採用中國古代的詩話體是極為自然的文體實踐。錢鍾書談藝論學，承襲歷代詩注、學術筆記的傳統，同時在使用中外典故、考獻徵文等方面所下的功夫深，究竟是為了與中國傳統文學進行靈活的對話，闡發感悟。在錢鍾書筆下的文言，往往予以賞析，易於發揮錢氏多年的讀書經驗中所積累的心得體會，這一點對於後來人解讀錢鍾書的學術著作和研究錢鍾書的文言文不無啓發，以及引發進一步的思考。

與《談藝錄》相比，有人曾指出《管錐編》多多少少亦可視為錢鍾書避世主義 (escapism) 下的作品，即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勉強從事於離本題最遠的學術工作，以收斂心思<sup>22)</sup>，正如錢鍾書所說的：「《管錐編》就是一種『私貨』；它採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迴隱晦的『伊索式語言』 (Aesopian language)」<sup>23)</sup>。由於此緣故，《管錐編》的文字更為難懂。加上，此書所涉及的範圍頗為廣泛，打通古今中外、穿越學科，試圖解構人類文化話語，難以把握作者的觀點。與此同時，錢鍾書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寫自己的讀書心得，從中挖掘那些不為人留意的事物，並將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像是一片多種語言組成的「引文叢林」<sup>24)</sup>，亦難以抓住作者要表達的重心。

然而除此之外，錢鍾書以文言行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關於此點，詳見《管錐編·周易正義》之《論易之三名·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中提出如下見解：

21) 《管錐編》的引文佔全書篇幅的一半以上。

22) 湯晏：《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台北：春山出版，2020年8月），頁377。

23) Ronald Egan. (2015). 'Guanzhui bian, Western Citation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Edited by Christopher Rea (Ed.). *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and the World of Letters* (Sinica Leidensia, 125).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5, pp. 130-131.

24) [德]莫芝宜佳著，馬樹德譯：《〈管錐編〉與杜甫新解·前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頁1。

黑格爾嘗鄙薄吾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辯；又自誇德語能冥契道妙，舉“奧伏赫變”（Aufheben）為例，以相反兩意融會於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無義蘊深富許者。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sup>25)</sup>

錢鍾書明確地指出中國語文（即「文言」）宜於思辯，他反駁黑格爾對文言文的無知與偏見，對文言的思辯特徵及其實際作用表示肯定，他認為在漢語中「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的實例頗多，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皇侃《論語義疏》自序：“捨字制音，呼之為‘倫’。……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再如「王」有五義、「機」有三義、「應」亦為三義，以及「佛字有五音六義」等，即「胥徵不僅一字能涵多義，抑且數意可以同時並用，『合諸科』於『一言』」<sup>26)</sup>。藉助錢鍾書的說法，即「賅眾理而約為一字，並行或歧出之分訓得以同時合訓焉，使不倍者交協、相反者互成」的辯證性質，從這點來講，無論是中國語文還是西方語文，兩者都沒有根本的區別。

實際上，當錢鍾書撰寫《管錘編》時，不僅以晦澀難懂的文言將自己的讀書心得毫不猶豫地記錄下來，而且還廣泛引用西方的原始文獻，以作為證據，涉及音韻、訓詁、經義、比較文學等多門學科。可見錢鍾書興趣廣闊，博學多識以至無所不容的精神，由此足以證明中國的「文言」宜於思辯。因此《管錘編》的每一條目，經錢鍾書的思辯和闡發，對學術命題加以闡釋<sup>27)</sup>，中國傳統學術因而被賦予現代價值與意義。在錢鍾書筆下，這是無可置疑的。

25) 錢鍾書：〈周易正義·論易之三名〉，《管錘編》（第一冊），頁1-2。

26) 同上，頁1。

27) 錢鍾書將中國傳統訓詁學與西方現代闡釋學相互打通，形成錢氏自己的闡釋思想，即所謂的「闡釋之循環」是錢鍾書文藝研究的基本方法論之一。

錢鍾書的文言，不同於同時期文人之半文半白的路子，所呈現的不只是錢氏獨特的寫作風格，更表現和傳達他的文學觀念。對錢鍾書來講，文言不只是撰寫文章的手段和文字表達的工具和形式，在動蕩的政治格局中表達自己的學術旨趣和詮釋方法，以至於其背後蘊含著錢鍾書對待文藝的心理和歷史的基本態度。

基於上述理由，錢鍾書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儘管著作並不多，卻留下他人難以超越的成就，錢氏的學術歷程等同於他的生命紀錄。從這一點來講，筆者謹慎認為《談藝錄》和《管錐編》不只是代表錢鍾書的學術著作，更成為永不磨滅的「思想遺產」。需要強調的是，這絕非是短時間內得到的，這與錢鍾書早期的文體意識及其實踐遙相呼應，深深蘊含著錢鍾書以「文言」述學的內在意涵。錢鍾書的一生都致力於做讀書筆記，就他而言，《談藝錄》和《管錐編》可被視為錢鍾書精煉的短篇論文和讀書札記的「組合體」<sup>28)</sup>，進而讓傳統與現代同時共存，互不排斥，給後代人留下兩者之間「對話」的機制。

#### 4. 結語

錢鍾書一生遊走於「文學」與「學術」之間，由此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個性，他寧願站在人生邊上，而不願意被主流社會認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氣質和心態。錢鍾書的寬容與自由，尤其在他的學術研究中，更成為了他一生追求的重要目標。作為一名學者的錢鍾書，在追求學問的道路上，持之以恆，不斷探索。錢鍾書始終博覽群書，涉獵廣泛，打通各家學說，縱橫古今中外徵引古今中外典籍。錢鍾書之所以能貫通古今，不只是其通曉英文以及其他外文，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在於他精通「文言」。文言既作為傳統文學創作的的基本前提，也作為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的工具，無疑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同時，也

28) 舒展：〈讀錢鍾書札札記——作者為何用文言著述〉，《直立的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頁29。

是歷史和現代之間的橋樑。

正是基於此，錢鍾書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不同，並未將文言看作一類「守舊」的、或者該「廢除」的文體，指出文言文的「彈性」，認為以文言文的「彈性」可容納新的思想。這是因為在錢氏看來，兩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顯而易見，由此呈現出錢鍾書學術思維的靈活性和包容性，其在思維上的特點深深地反映在他的學術著作《談藝錄》和《管錐編》。

錢鍾書在自己的著述中以簡練精闢的文言文來述學，不僅實現了文言文本身所具有的美感，而且也使得錢鍾書的觀點更犀利而富有深度，從而對錢鍾書以「議論」為主要表達方式、「引經據典」和「旁征博引」的論證方法的選擇及其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撐。就錢鍾書而言，文言可作為表達自己的學術旨趣和詮釋方法，以至於其背後蘊含著錢鍾書對待文藝的心理和歷史的基本態度。

## 參考文獻

- 錢鍾書，〈與張君曉峯書〉，《國風》第5卷第1期，1934年7月1日。
- 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李洪岩，《錢鍾書與近代學人》，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
-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德]莫芝宜佳著；馬樹德譯，《〈管錐編〉與杜甫新解·前言》，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舒展，《直立的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 湯晏，《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台北：春山出版，2020年。
- 謝泳，《錢鍾書交游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 Ronald Egan. 'Guanzhui bian, Western Citation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Edited by Christopher Rea (Ed.). *China's Literary Cosmopolitans: Qian Zhongshu, Yang Jiang, and the World of Letters* (Sinica Leidensia, 125).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5.
- 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
- 鄭延國，〈錢鍾書「化境」論與《談藝錄》譯句管窺〉，《翻譯學報》第三期，1999年。
- 張隆溪，〈自成一家風骨——談錢鍾書著作的特點兼論系統與片斷思想的價值〉，《讀書》第10期，1992年。
- 張隆溪，〈懷念錢鍾書先生〉，《香港文學》第173期，1999年。
-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中國時報》1998年12月24日。
- 柳詒徵，〈國風·發刊詞〉，《國風》創刊號，1932年9月1日。
- 夏志清，〈追念錢鍾書先生——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中國時報》1976年2月9日至10日。
- 《清華大學舉辦追思錢鍾書先生系列紀念活動》，<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012/2117.htm>，檢閱日期：2024年12月19日。

## Abstract

### Subsequent and Extension: a case study of Qian Zhongshu and classical Chinese

Han, Ji Yeon

In the 1930s, Qian Zhongshu clearly summarized his literary thoughts in a single article. Among them, Qian's views on 'classical Chinese' is remarkable: the 'The Debate over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Language' that occurred in the complex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also seen as a revolution, but Qian regarded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as complementary and co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Qian believed that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prose borrowed from each other, pointed out the 'elastic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regarded classical Chinese as the natural carrier of dialogu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looking for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and using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carry out his academic research; Qian and 'classical Chinese' have an inseparable overall connection with his academic research. Qian's *On the Art of Poetry* and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oetry Mind & Literary Mind* were both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fully demonstrating Qian's eclectic style of scholarship, and the implications behind it cannot be ignored. For Qian Zhongshu, classical Chinese is not just a means of writing articles and a form of written expression, but also a way to express his academic interests and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in an era of fierce collision between new and old cul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a turbulent political landscape. Behind it is Qian's basic psych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ttitude towards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 Qian Zhongshu, classical Chinese, Elasticity, *On the Art of Poetry*,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Poetry Mind, Literary Mind

투 고 일 : 2025. 4. 10. / 심 사 일 : 2025. 4. 15.~ 2025.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5. 20.